

走近神秘的北欧教育——

“求平均”的基础教育何以孵化出创新苗子



北欧教育始终崇尚对体育的极度热爱。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在号称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挪威，儿童的“幸福生活”是这样的：4℃的倾盆大雨中，背着大书包去树林里走上40分钟，然后露营；三天中只有干面包可以吃……在一名久居挪威的中国妈妈眼里，如此的“幸福生活”，她起初有点接受不了。

挪威、瑞典，坐落在斯塔的纳维亚半岛上的这两个国家，与毗邻的芬兰、丹麦，往往被统称为“北欧四国”。不论是维京海盗、欧若拉神话、炫目北极光，还是走到现代的北欧创新、诺贝尔奖诞生地、芬兰教育传奇等，都让外界对这片远离欧亚大陆中心的土地充满好奇。

这片地广人稀的土地，为何会孕育出灿若星河的创新品牌？教育在它们的创新进程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求平均”的社会文化下，如何鼓励社会大众创新，避免陷入“懒人社会”？眼下，北欧教育已吸引我国部分学者的目光，也有少部分中国留学生走上赴北欧小语种国家留学之路。由此，神秘的北欧教育得以被逐渐打开。

挪威人说，“只有不好的衣服，没有不好的天气。”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论什么天气，都要出门锻炼。这种理念在当地教育中获得了生动体现。

8月的厄里尔小镇，中午室外的最高温度也不过21℃，湖面上凉风阵阵，大人们几乎都穿着冲锋衣。9岁的安娜嘻嘻哈哈地与小伙伴换上了泳衣，“扑通——”，几个小学生就这样下水了。

“不冷吗？”对于记者的疑问，安娜的母亲玛丽安耸耸肩，“挪威的冬天很冷，夏天是他们接触大自然的宝贵时机。”玛丽安说，挪威孩子们的夏天几乎都是这样过的，踢足球、游泳；到了冬天，冰雪覆盖大地，那就滑雪、登山。

挪威教育始终崇尚对体育，尤其是对户外运动极度热爱。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已深深根植于文化之中，对很多家长来说，“足球训练比考试还重要”。

“挪威人说，‘只有不好的衣服，没有不好的天气。’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什么天气，都要出门锻炼。”在挪威从事教育工作多年的王蕾老师告诉记者，体能训练是挪威教育中很重要的方面，从幼儿园就开始了。

王蕾的孩子也在挪威接受教育。她记得三女儿小学毕业时，按学校的传统，老师带着所有孩子晚上十点出发，在山上走了一夜，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六点，这样一次通宵登山给孩子们的童年时代划上了句号。

除了体教结合，医教结合也是挪威教育的一大特色。挪威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营养搭配与食品健康课程、牙齿保健课程，以及性教育、身体与心理健康发展课程。比较有特色的一项内容是“反校园欺凌”。

王蕾的印象中，挪威小学在最初的几周里不强调学习，而是让大家彼此认识，交朋友，唱反霸凌之歌，制定各种规则。并且，学校会组织学生家长互相认识。接下来的小学七年中，几乎每一周、每一天，学校都要继续这个话题，很多学校门口挂着印有“霸凌零容忍”的标语。

这个教育特色，源自挪威教育家丹·奥维尔斯（Dan Olweus），他是世界上最早研究校园霸凌的学者，总结了一套预防霸凌的理论和行动方案。因为他的推动，挪威大部分学校已认识到，打架这类霸凌是容易解决的，较难解决的是“隐形霸凌”。比如“女孩小团体”，一个眼神、私下一句话等可能形成隐形霸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要找出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可以采取全班问卷的方式予以解决——因为，

学校、老师、家长和学生，都是反校园霸凌的一分子。

“反校园霸凌可能是挪威教育特色的一个缩影。它考虑的是，如果想从根本上解决校园霸凌，外部监管是有限的，得给孩子一个健全的人格，才能从根本上改变霸凌。王蕾对记者说。

北欧的基础教育整体上烙印着“求平均”的色彩，这里孕育了“芬兰教育神话”，也不乏对教育的反思。

挪威教育的一些独特做法，更像是一个个窗口，让我们得以管窥北欧教育。在这片土地上，很多做法是类似的，包括“快乐教育”“免费教育”。

观察北欧四国的教育，绕不开“求平均”的理念，很多独特的教育做法正是以它为起点。

以挪威为例。基础义务教育共十年，孩子6岁上学，小学七年，初中三年，初中毕业后可以选择上普通高中或职业高中。之后可以找工作，也可以考大学。在此期间，从小到大的全部教育都是免费的，甚至对外国人也一样。基础教育的学校没有好坏之分，天才儿童与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在一个班里，由同一位老师来教，包括残疾儿童，基本没有特殊的学校。

人人受教育的机会有平等，这是北欧社会的最大特点。这种对公平的强调，体现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落点之一就是，强调以兴趣出发，鼓励每个孩子找到适合自己的路。一位挪威家长自嘲自己是“学渣”，原来，他小时候学习成绩很糟糕，却喜欢捣鼓花草，“老师也鼓励我追逐理想，如今我是一名花匠，生活得很好。”

因为“求平均”的社会氛围与制度设计，让北欧国家的人群收入差异不是很大，花匠、木匠与大学教授、金融从业者的收入不那么悬殊。不得不说，这是个人以兴趣为先发展的一个社会前提。在北欧，“求平均”的分配机制有多么极致？据说，在瑞典有一个很诙谐的说法，瑞典人会不好意思把手拿出来给别人看，因为五个指头不一样长。

在“求平均”的社会氛围下，北欧教育不是强调“如何让优秀生变得更好”的精英式教育，而是更多强调“如何让差生找到自己的价值”。事实上，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诞生了“芬兰教育神话”。

在保证每个孩子获得教育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芬兰始终保持着比较传统的教学法，让学生的整体表现都保持在中上水准。在最近十多年的多项国际学生学业表现竞赛中，芬兰都获得了高分。

芬兰教育的脱颖而出，这些年也触动了北欧其他一些国家反思。

2013年前后，受到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触动的丹麦人，拉了一家当地电视台摄制组，跑到中国哈尔滨一所中学，拍摄了一部中丹教育比较纪录片《丹麦9年Z班VS中国初三13班》。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丹麦基础教育的一些薄弱环节。比如，一个丹麦初中生在回答“200的50%是多少”的时候，答案竟然是“4”。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太多想让孩子快乐，于是举办了很多无法学到知识的集体活动。但实际上，让学生感到快乐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让孩子专注于学习，源自于学习的动力、执着和成果，同样能让学生感到快乐，丹麦应该反思自己的这一教育行为。”一位丹麦教育专家在纪录片中谈到。

到底是亚洲式强调模仿、记忆的教育方式好，还是西方强调兴趣、个性的教育好，不只是中国人在讨论，西方人也在讨论。

“芬兰的教学法也在被其他北欧国家研究，因为芬兰在地理环境上介于东西方之间，所以借鉴了东西方国家的各自优点。”在王蕾看来，当北欧其

他国家趋向西方“快乐教育”“自由创新”“以兴趣为导向”等方向时，芬兰教育兼顾了中西教育的强项，在强调反复操练和崇尚自由的两种教育体系中取了一个较好的平均值。

对“求平均”的极度追求，孕育出令人艳羡的北欧高福利社会，但随之而来的隐患是：这会不会催生“懒人社会”，让人们没有了进取心，没有了创新、创造的动力？

在奥斯陆大学从事癌症研究的盛夏倒不那么认为。在挪威待了几年，与当地博士生、博士后共事，他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挪威当地学生也很拼。“有人做实验会做到半夜，甚至周末也不休息。”

高福利北欧诸国也曾是“穷出身”，这让北欧人天生具有不断创新求得发展的忧患意识，高等学府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北欧诸国，高等教育表现出与基础教育很不同的一面：学业竞争不小，对学术的追逐热情旺盛。在一些中国留学生看来，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里的基础教育强调兴趣为先，而步入高等教育阶段，尤其是研究生阶段，真正对科研有兴趣的学生走了进来。没有太多功利目的，反倒是出于对某个学科的强烈热爱，这让他们能更从容地从事科学探究。

细观北欧世界，大学与社会创新进步关系密切。以挪威奥斯陆大学为例，学校不大，却走出了近十名诺贝尔奖得主，包括经济学奖、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等，仅奥斯陆大学经济学院，就诞生了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此外，挪威特色学科与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包括深海鱼类养殖、造船等，也诞生了卑尔根大学的海上石油勘探、特罗姆瑟大学北极研究等诸多王牌学科。

挪威不是孤案。瑞典的创新亦十分璀璨，诞生了宜家、沃尔沃、爱立信、H&M等一系列世界知名的创新品牌，也诞生了用于肿瘤治疗的伽玛刀、Skype即时通讯软件等现代应用。世界上最知名的瑞典科学家恐怕绕不开19世纪末期发明炸药和设立诺贝尔奖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至今颁发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被广泛认为在医学研究上仅次于美国哈佛大学。此



外，瑞典皇家工学院、查尔摩斯工学院也都属于欧洲著名工科大学之列。

丹麦呢？这里不止有安徒生童话，哥本哈根被誉为“创新之都”，微软在哥本哈根创办了欧洲最大的研究中心，C++语言是丹麦人开发的，这里还有生命科学领域欧洲最先进的产业集群之

一，许多大型制药公司在此安家。

在北欧，与当地入深入交谈后，你会惊讶于一个现实：这些高福利国家，曾经都是“穷出身”。挪威退休教师奇斯特女士告诉记者一段童年往事：上世纪50年代，她还是孩子时，挪威人普遍的主食就是土豆，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在这块地球北部苦寒之地大规模种植且十分扛饿的食物。

“挪威是在发现石油后，才逐渐变得富有的。”很多当地人会告诉你这个事实。与挪威类似，北欧其他国家曾经都是资源贫乏的国家，国土面积不大，资源也十分有限，人也少，没有人口红利可言。这让北欧在很长一段时期是欧洲最为贫穷的地区。正部分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让北欧小国纷纷走上“科技强国”之路，以科技创新带动社会经济发展，在此期间，十分重视教育对创新的推动，对大学的投入不遗余力。

成功的原因不只一个。也有分析认为，北欧的地缘位置让这里的人天生具有开拓边界与探索未知的基因。比如，挪威诞生了很多探险家，从早期的维京人，到后来的极地探险家，因为对未知的好奇，催生了造船业、极地研究等蓬勃发展。

这些年，挪威等北欧诸国都有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讨论，并推动一些改进，比如对学生纪律要求更严格。不过，当地的一些教育观察者在与记者探讨后，达成如下共识：如同离开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谈教育，不切实际一样；离开孩子个体本身谈教育，也是不合适的。每种教育方法都有利弊，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 厄里尔小镇居民为上海校园女足队加油助威。



▲ 上海校园女足队员与挪威友好球队互赠礼物。

► 挪威当地小朋友被发动起来，去赛场拾垃圾。

一起来踢球吧，女孩们！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捧着冠军奖杯，上海梅陇中学校长卫洪光一路接受着各国孩子、家长、老师们的注目礼。对这支上海的初中女足队伍而言，首次出征“挪威杯”这一国际青少年足球赛，收获的倒不仅是奖杯。

这支惊动挪威首相的上海校园女足队，此次深入挪威的小镇学校，与当地校园足球队“同吃同住”，打开了双方关于体教结合、医教结合的有趣对话。

小镇迎来上海女足，“Shang-hai”响彻赛场

8月6日，奥斯陆艾克伯格学校的球场上，上海梅陇中学女足队与挪威一支当地女子足球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冠军争夺赛。当裁判吹响比赛终止的哨声，全场沸腾，上海女孩们首次出征“挪威杯”就以7:1的战绩一举夺得ClassP组别的冠军。

“他们踢得太棒了！”欢呼人群中，一支拉拉队很抢眼，他们是挪威东部厄里尔小镇马尔科学校的学生和家长们，一行人丁零当啷地带来了大鼓、横幅，以及各种助威小喇叭，配以全程的“Shang-hai! Shang-hai!”高分贝助威声。

这一拉拉队丝毫没有因为给外国球队助威而担心背负“背叛”的骂名，挪威当地球队的家长拉拉队也不介意，“享受足球”让大家都很欢乐，相安无事。

“挪威杯”是世界上最大的儿童青少年足球锦标赛，年龄跨度从6岁到19岁，自1972年首届比赛以来，影响力不断扩大。近年来，每年都有50多个国家的2000多支球队参赛。这里也被认为是“女足的发源地”，1972年的首届比赛就邀请了八支女足队伍参赛，比挪威足球联赛承认女子足球还要早四年。

依据“挪威杯”的传统，厄里尔小镇马尔科学校的女足队与上海梅陇中学的女足队伍结成友好球队，这个组合开启了两地有趣的足球对话。

上海女孩们以七场不败、61粒进球的彪炳战绩，震惊了这个挪威小镇的校园足球队。“能认识这群上海伙伴，太让我兴奋了。”马尔科学校女足姑娘卡桑德德为上海友好球队自豪。

比赛间隙，这支来自上海的初中生女足还造访了厄里尔小镇，与友好

球队同吃同住了两天。小镇居民为此很兴奋，因为他们知道，这支上海球队还惊动了挪威首相。今年4月，挪威首相索尔贝格访问上海，专程到访被称为“女足摇篮”的梅陇中学，并邀请球队参加今年的“挪威杯”。

震惊是双向的。在挪威，校园足球的盛行，也让上海球队直呼不可思议。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个足球教练和球迷

“女孩们，一起踢球吧！”很多挪威人会告诉你，让女孩上场踢球这件事，是他们最早提出的；当然，对男孩，更是如此。

“这里的足球氛围太浓郁了！三四岁的孩子走路都走不稳，甚至刚学会走路，就开始踢球了。家长就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个教练，也是第一个球迷。”梅陇中学女足教练钱惠受邀住在马尔科学校一个学生家时发现，家长把谷仓改造成室内足球训练场，让6岁的孩子在这里训练脚法。

马尔科学校涵盖从小学到中学的10个年级，女孩们几乎个个会踢球。这里的家长们会组建起足球俱乐部，轮流当教练——他们小时候也都是校园足球队的！

50岁的玛丽安就是家长教练之一，她的两个女儿都参加了校园女足，玛丽安小时候也踢球，“当时还没有女足，我就把头发剪短，混在男生队，也没有人分辨出我是女孩。”她高兴地对记者说。

挪威《教育法》规定，家长是孩子教育的首要负责人。有了这种理念，再来看这座小镇学校里，家长对教育的高度参与，就不足为奇了。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对体教结合的支持，体现在建造并维护球场。在挪威，学校最大的地方就是足球场。以艾克伯格学校为例，34个标准足球场一眼望不到头，高低起伏简直就是一座“足球山”，且每片场地都有孩子在奔跑、在踢球，场面很壮观。

“这里的孩子6岁就上场踢球了，真是从娃娃抓起。”钱惠教练很受启发，在上海，她和伙伴们坚持了20多年，形成了“金沙江路小学-梅陇中学-曹杨二中一条龙”女足训练模式。这一回，她寻思着要从幼儿园抓起。

女孩们为什么要踢球？绝不仅仅是要当球星

踢球不是女孩们的唯一出路。梅陇中学校长卫洪光说，以前少年足球主要依靠体校培养模式，足球小队员与普通孩子之间是隔离的。20多年前，上海开始探索“体教结合”模式，即让踢球的孩子到普通学校就读，体育局专业教练到学校指导足球训练。而率先试点的普陀校园女足就获得了成功。

“体教结合有利于孩子的全面发展，他们中的一些人将来可以走上职业球员的道路，但也有不少人进入高等学府，因为他们获得的教育是全面的。”卫洪光说，他们的探索围绕着一句话：“做好人，读好书，踢好球。”

这些年，名气不小的普陀校园女足征战过很多国际青少年赛事，成绩斐然，也为国家队输送了很多专业队员，不乏赵丽娜这样的足球名将。

“作为教练，我当然希望孩子们踢进国家队，但踢球也需要天赋，不是所有人都要走上专业足球运动员的道路，甚至成为球星。但这不影响孩子们喜欢足球。”在钱惠的女足学生里，不乏任晓彤这样的“学霸”球员，2012年她通过千分考进入复旦大学，后来成为复旦女足队长，在大学里传播足球文化。

校园足球队，绝不仅仅只是为了培养球星。这点在挪威教育体系中更有着深刻的理解。为什么要鼓励孩子们踢球？很多挪威家长会告诉你们，运动可以结交朋友，可以懂得与他人合作，可以训练观察力、协调力、意志力等。体能成为校园文化中很重要的一块。挪威人甚至认为：人之所以会生病，就是因为没好锻炼。所以从幼儿园起，挪威的学校就教育孩子如何节制饮食，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身体、体重等，医教结合、体教结合贯穿始终。

体育被赋予的教育色彩不止这些。“挪威杯不止是球赛，在这里6岁的孩子就可以上场踢球了，但最小参与者是5岁，他们被发动起来去赛场、海滩边捡垃圾，宣扬保护海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挪威杯”秘书处负责人露西对记者说，“挪威杯”的官方足球又称“SDG（可持续）足球”，因为联合国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印在了足球上，并在比赛全程宣扬“消灭歧视”“保护海洋”等可持续发展理念，一个足球由此被不断赋予教育的潜在内涵。

